

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的三重逻辑探析

满红芳¹, 陈永强²

(1. 聊城大学 图书馆, 山东 聊城 252000;

2. 中共聊城市委党校,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核心密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其历史逻辑起点根植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实践需求,关键在于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才能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推进“两个结合”既破解了社会主要矛盾,又通过本土化避免了教条主义。理论逻辑上,二者辩证共生、相互成就,“第一个结合”立足中国实际转化实践方案,“第二个结合”激活文化根脉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传统文化沃土,形成“双轮驱动”机制。推进“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密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首次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个结合”在探索中艰难前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理论新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实现理论新飞跃。

关键词:“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必然性;理论创新;实践演进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5) 06-0011-08

收稿日期: 2025-09-23

作者简介: 1. 满红芳(1973-),女,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2. 陈永强(1972-),男,山东临清人,中共聊城市委党校教授。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6.010

“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的核心密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是基于历史必然、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第一个结合”立足中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转化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方案,避免照搬照抄式的教条主义;“第二个结合”激活文化根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生根结果,破解文化断裂危机。二者辩证共生、相互成就,前者为后者提供实践场域,后者为前者注入文化底蕴,共同构建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双轮驱动”机制。通过推进“两个结合”,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扎根国情、回应民需,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与时俱进、赋能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了根基。

一、历史逻辑:推进“两个结合”是完成近代中国革命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思想的诞生。同一时代,大清王朝正笼罩在鸦片战争后的制度性危机中。两者在19世纪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与传统秩序解体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看似平行却暗含共振的发展轨迹。从文明演进的长周期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建构与中华文明的智慧积淀的相遇,并非机械的理论嫁接,而是基于中国救亡图存实践需求的创造性转化。前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石,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客观规律;后者则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哲学理念为核心,构建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与实践逻辑。这种差异显著的文明基因,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转型期实现了深层对话: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剖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中“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传播提供了文化土壤。最终共同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文明形态与发展路径。

(一)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

历史上,农耕文明的古代中国长期领先世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鸦片战争以来,在与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列强的比较中全面落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局

势，无数仁人志士艰难探索救亡图存之路。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来实现富国强兵，却因封建制度的腐朽而未能触及根本，最终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宣告破产。太平天国运动以农民阶级为主体，虽建立了政权，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缺乏科学理论指导，无法摆脱旧式农民运动的窠臼。戊戌变法寄希望于封建统治者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然而在守旧势力的强大阻挠下，如昙花一现般迅速失败。义和团运动虽展现出了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但因其盲目排外和迷信色彩，难以形成有效的斗争力量。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帝国历史终于结束了，但人们憧憬的共和国步履维艰，随着袁世凯复辟闹剧的结束，年轻的共和国又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与此同时，西方的各种学术流派纷纷登场。这些思潮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探索愿望，但由于脱离中国实际，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最终都未能找到拯救中国的有效途径。在漫长的黑暗中，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思想上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此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①。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让在黑暗中苦苦探寻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俄国的胜利，使迷茫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②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些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创办刊物、撰写文章、组织社团、发表演讲等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深入人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也“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霞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③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④风雨飘摇中的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历尽苦难、带领中华民族不断走向辉煌，中华民族也扭转了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从此走上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之路。

（二）马克思主义只有本土化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的，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同样，它本身也蕴含着创新发展的要求，始终遵循着“以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内在规律。《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⑤。这一核心观点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坚决批判教条主义，他认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⑥。马克思强调：“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⑦。

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⑧，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而非束之高阁的理论，要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指导人们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⑨。俄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③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④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3-151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运用，俄国面临着与西欧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如果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欧革命的理论，革命必然难以成功。俄国的革命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才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充分证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辩证统一起来，才能发挥其强大的指导作用。恩格斯用“本国服装”来比喻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穿上“本国服装”，才能在不同国家落地生根。曾针对美国工人运动指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①。早期美国工人运动直接移植欧洲的工人运动理论和模式，没有考虑到美国独特的文化、社会和历史背景，导致运动进展缓慢。美国的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与欧洲文化有很大差异。后来，美国工人运动结合本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了符合美国国情的工人运动理论和策略，才使得工人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同样需要本土化，中西文化存在诸多差异，西方文化注重理性分析、个体本位，而中国文化强调整体观念、伦理道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必须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才能成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经照搬苏俄经验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20 世纪 20 年代，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路径选择上，曾一度机械复制苏俄“城市中心论”模式，这种脱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决策，曾导致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挫折。当时党内存在显著认识分歧：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领导者坚持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头脑与心腹”，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敏锐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1930 年李立三更是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致使红二军团在进攻长沙时伤亡达 4000 余人。这些实践反复证明，不从中国农业人口占比 90%、反动势力盘踞城市的实际出发，盲目套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公式，只会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直至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才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

二、理论逻辑：推进“两个结合”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生机和活力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推进“两个结合”，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什么“贫困的历史决定论”^②，而是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③，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并非仅仅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也关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各种社会要素中，归根到底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才被称为科学的世界观，成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1. 马克思主义具备科学性与实践性交融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革命性突破。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它既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遗产，又以辩证扬弃的方式实现理论超越。马克思恩格斯穿透纷繁复杂的社会表象，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建构起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双重维度。这种科学特质不仅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规律的深刻揭示，更在于通过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指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当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激化至临界点时，社会主义必将成为历史必然选择。正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94 页。

^②[英]卡尔·波普尔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收藏版，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450 页。

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

2.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贡献在于将哲学革命转化为认识工具，构建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方法论范式。其唯物辩证法既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更是将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的创举。通过“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运动，马克思主义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式，形成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回归实践具体的认知闭环。正如恩格斯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种动态开放的方法论特质，使其始终保持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3. 马克思主义拥有人民性与革命性并重的价值立场。马克思主义彻底颠覆了英雄史观的思想传统，首次将人民群众确立为历史创造的主体。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剖析，它揭示出无产阶级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是埋葬旧制度的掘墓人。这种阶级分析并非简单的道义批判，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把握之上。当资产阶级将劳动异化为资本增殖工具时，也必然锻造出否定自身的物质力量。这种理论彻底性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集中展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将人类解放的理想从抽象思辨拉回现实大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为劳动者掌握自身命运提供了理论武器。

4.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与建设性共生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以改造世界为旨归的行动纲领。它既以“无情批判”的态度解构旧世界，又通过“实践唯物主义”建构新世界。这种双重特质在当代愈发显现其现实意义：当资本逻辑侵蚀人类文明根基时，马克思主义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为破解现代性困境提供钥匙；当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生存时，其“物质变换”理论为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这种理论既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性理解，也包含对事物必然灭亡的肯定性理解，在破与立的辩证运动中始终保持理论张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5. 马克思主义具备开放性与时代性兼具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不在于终结真理，而在于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其基本原理与方法论构成相对稳定的理论硬核，而具体结论则随着实践发展不断更新。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充分彰显——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创新发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阐释，马克思主义始终在与具体实践的结合中焕发勃勃生机。这种既坚守“老祖宗”又讲“新话”的理论创新逻辑，正是马克思主义跨越时空的思想密钥。

（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②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性与重大意义。

1.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构成二者契合互补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其核心在于以实践为基础的动态发展。《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发表以来，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不同版本序言的补充修正，持续回应时代问题，展现出“在实践中发展真理”的开放性。这种特性使其能够突破地域与文化限制，与不同文明深度对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以“海纳百川”为核心特质，宋明理学面对佛教思辨哲学的冲击，将佛教“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与儒家伦理结合，构建了“理一分殊”的哲学体系，既保持儒家内核，又推动文化自我革新。二者在实践路径上高度一致，马克思主义通过与各国具体实际结合实现本土化，中华传统文化则通过与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保持活力。这种“开放—包容”的内在一致性，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

^①《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

^②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契合表现出深层的共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命题存在跨越时空的契合，具体体现为四个维度：

第一，在社会理想上两者表现了从“大同”到共产主义的价值认同。《礼记·礼运》“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在核心目标上高度契合：二者均以“公”为价值核心，超越私利，坚守公义，反对少数人独占资源。《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描述的大同社会“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与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共同指向社会资源全民共享的公平原则；大同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各得其所”，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按需分配”，均体现了追求分配正义与个体发展，“让每个成员尊严生活、自由发展”的社会价值；大同社会“讲信修睦，选贤与能”的人际关系理想，与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念，共同以“和谐共生”为终极目标。这种契合本质是人类对公平正义的永恒追求。

第二，在自然观上都具有“天人合一”与“人化自然”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的生态核心理念，庄子“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主张“道法自然”“顺应规律”。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人化自然”概念，指出人既依赖自然又通过实践改造自然，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遵循自然规律，又以“改造自然”强调实践能动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是二者融合的典范：强调既要尊重自然规律，守护生态本底，又要发挥人的能动性，通过绿色发展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第三，在政治立场上产生“民惟邦本”与群众史观的共鸣。中华传统文化“民为邦本”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共享“人民主体”的价值立场。传统民本的实践智慧：《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均强调“执政者需以民为本”，人民是国家根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则认为人民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二者在今天的实践中融合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成“执政为民”的当代政治伦理。

第四，在方法论上传统“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高度契合。王阳明“知行合一”强调“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主张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道德认知必须转化为行动。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高度一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二者均将实践视为认识的目的与检验标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正是这种融合的典范：既继承“经世致用”的传统，又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形成“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方法论。

3. 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与升华。中华传统文化诞生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这种经济模式使得人们的活动范围相对狭窄，不可避免存在保守性与局限性。尽管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消极因素并非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们的影响却不容小觑，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同时，封建制度下的君主专制，强化了诸多消极因素。诸如传统社会中人情关系网呈现出的“差序格局”，血缘、人情往往大于公平正义，与现代法治强调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相冲突；“德治”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自律，缺乏明确的规则 and 标准，“德治”优先使得法律成为维护道德的工具，人们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规则意识淡薄，导致“人治”倾向；三纲五常造就的等级观念与宗法桎梏与平等、自由的现代价值相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武器，甄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剥离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宗法桎梏等与现代社会发展相悖的封建残余，彻底否定“君权神授”“男尊女卑”等落后观念；保留其符合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因子，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得以发展为现代中国文化新形态。这种激活使传统文化突破历史局限，发展为“传统根脉+时代精神”的现代中国文化新形态，为理论创新与制度建设提供深厚文化支撑。

三、实践逻辑：推进“两个结合”是正确和深入回答重大时代课题的根本路径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并非照搬现成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而是立足中国实际推动其本土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

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两个结合”始终是破解时代课题、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根本路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破冰

面对近代中国政治主权丧失、经济畸形发展、文化殖民渗透的危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反帝反封建纲领，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征程，核心是回答“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即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1925年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阶级分析法为核心，明确革命力量构成：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农民阶级为主要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为可争取的中间力量，地主与买办资产阶级为直接革命对象。这一分析摆脱了共产国际经验的机械照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根基。党内早期曾出现“二次革命论”（陈独秀）与“左”倾冒险主义（瞿秋白）等错误思想，八七会议后逐步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农民运动的核心地位。1937年《实践论》《矛盾论》系统批判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前者阐明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②，奠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者构建矛盾分析方法论，强调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为革命战略提供思想武器。两本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党的思维方式，统一了党内思想，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城市暴动相继受挫。毛泽东率部转向农村，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标志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农村斗争是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确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土地革命中，《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与《兴国土地法》（1929年）逐步完善分配原则，激发农民革命热情；“党指挥枪”原则与“十六字诀”游击战战术形成军事体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为全国政权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尽管“第二个结合”尚未明确提出，但党已开始探索文化融合：《矛盾论》的“矛盾特殊性”思想与“因地制宜”传统智慧呼应；“打土豪、分田地”口号传承“均田免赋”革命理想；红军长征精神与“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契合。这种融合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文化生命力，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曲折中艰难前行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课题，核心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标志着突破教条主义、探索本土化路径的开端。这一时期的理论创新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核心是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构建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1956年《论十大关系》首次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框架，提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需突破苏联模式，主张“多发展农业、轻工业支撑重工业”。经济领域通过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赎买”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政治领域构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1954年宪法确立人大制度、政协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文化领域将“实事求是”传统治学理念转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对传统戏曲（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进行“推陈出新”改编。

1958年后，党内出现超越生产力水平的冒进倾向，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行“一大二公”与供给制，导致共产风盛行；“大跃进”中“赶英超美”目标引发全民炼钢运动与粮食征购过头，导致1960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文化领域“批林批孔”运动割裂文化遗产，“样板戏”垄断文艺创作，限制多元价值观。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保障缺失与纠错机制失灵，1957年后党内民主集中制弱化，对错误的批评被压制，制度性纠错机制长期缺失。这一阶段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需以实事求是为前提，以制度保障为支撑，才能成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实践

^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8年第5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3、284、294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临如何总结历史经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人民摆脱贫困的时代课题,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命题。“两个结合”在此阶段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市场经济实践的融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同志立足中国国情与国际形势,面对“文革”后思想僵化的困局,深刻洞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1979年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打破“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教条束缚,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①这一理论创新既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又吸收“义利兼顾”的中华传统经济伦理,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协同联动,既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又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价格改革以“双轨制”过渡实现市场定价;国企改革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财税、金融、外贸配套改革同步推进。这一过程避免了照搬西方模式导致的经济波动,创造了高速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双重奇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生动实践。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需要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制度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深化,这一命题深化了“第一个结合”的历史经验,通过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文化根基,成为新时代思想解放与文化复兴的核心动力。

“两个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根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源于“两个结合”所赋予的历史纵深与文化底蕴。当西方现代化模式深陷资本逻辑主导、社会撕裂加剧的困境时,中国通过“结合”走出了一条迥异的发展路径——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②以“民为邦本”传统智慧支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浙江“千万工程”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升华为乡村全面振兴实践;以“天人合一”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发展全局;以“家国情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国家—社会—个人”良性互动。这一道路既突破西方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困境,又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基因的深度融合:“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协和万邦”传统结合,“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合群众观点与“民为邦本”思想。这些创新不仅指导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实践,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两个结合”通过“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③,构建起独立自主的文化主体性。话语体系上,以“小康社会”“天下为公”阐释发展理念,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文明话语库;文化自信上,打破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推动“一带一路”“和合共生”理念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④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②杜尚泽:《“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9日。

^③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④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其核心意义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既破解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困境，又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机与中华文明的文化根脉。党的百余年的实践证明：脱离中国实际会陷入教条主义误区，割裂文化传统则导致精神根基动摇，唯有坚持“双轮驱动”，才能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不断回答时代课题。进入新时代，“两个结合”通过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文化主体性，不仅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密钥，更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An Exploration of the Triple Logic Behind the CPC's Advancement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MAN Hong-fang¹, CHEN Yong-qiang²

(1. Library of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2.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Liaocheng Municipal Committee,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The “Two Integrations” represent the core code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fundamental path for advancing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is concept is rooted in the practical demands of saving and rejuvenating China in modern times, with the key being the need to localize Marxism to solve major issues in China’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The promotion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not only resolves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but also avoids dogmatism through localization. Logically, the two are dialectically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The “First Integration” is based on China’s reality to transform practical solutions, while the “Second Integration” activates cultural roots, allowing Marxism to take root in the fertile soi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ming a “dual-wheel drive” mechanism. The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promoting the “Two Integrations”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the first combination was achieved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Two Integrations” advanced with difficulty through exploration; in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realistic thought line was re-established, achieving a new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econd Integration” was explicitly proposed, marking a new theoretical leap. Promoting the “Two Integrations” is the ideological key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correctly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and lead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Two Integrations”;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ractical evolution

[责任编辑 如初]